



# 被遣散的红小兵

——六十年代生人调查

于长江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  
带来了我的烦恼；  
我的心中，早已有了她，  
哦，她比你先到……

这是80年代大学校园里一度非常流行的一首歌，被戏称为“校歌”，它的平实直白，不仅随意上口，而且在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就好像五四时代人们放弃了文言文，转向白话文一样，这样的歌，相对于70年代充满了宏大话语或意识形态教诲的歌曲来说，实在是一种解放。

这是当时20岁左右的大学生及其同龄人的心

境。80年代的他们，差不多是60年代出生的一代，这一代人，究竟怎么称呼呢？人们称呼一代人，习惯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照出生的时代，一种是依照青春的时代，所以这一代人，可以说60年代出生，也可以说80年代青年，究竟是“六六大顺”还是“八八发财”，还真不好取舍。

不过，今天回首这支80年代的爱情歌谣，却另有一些感悟。它表达或掩饰的心态，似乎不仅仅在于一个艳福不浅的幸运儿面对纷至沓来的靓妹帅哥的遗憾，事实上，这几句歌词，似乎隐喻了这一代人共有的一种更为广阔的情怀，或者说，这种“迟到”的困

惑,又何尝不是80年代青年集体无意识支配的一种微妙的时代气息?

而今这些人也差不多人到中年了,可是少有人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不过有些偶然的场景,也会唤起人们对这一代人的某种好奇心。记得几年前,在海淀一带出现过一家“80年代酒吧”,一位80年代的北大学生,买下了一家小酒吧,略作装修,取名“80年代”,他本人虽为老板,但因为另有高就,其实也不指望这个酒吧赚钱,只是每到周末,约几个哥们儿一起,抱着吉他在此为大家弹唱一些80年代的老歌,一时间,酒吧生意火爆,很多80年代的人们,天天云集于此,旧人重逢,相见难识,神似形异,恍如隔世,后来酒吧因为某些技术原因,戛然而止,更造成了乍暖还寒、一枕黄粱的感叹。

如果说这个酒吧是80年代大学生群体十多年后的一种自发怀旧的集结,那么近日出版的《通州艺术家演义》一书,又从艺术群体的角度,激活了人们对于这一代人的关注。这本书作者本身也是艺术家群体的一员,本来是基于日常不经意的耳闻目睹,却成了一段历史的见证。作者以随笔的方式,轻松描述北京通州一带艺术家群落中一些人物的来龙去脉和喜怒哀乐,但阅读此书,不禁发现,这么多年来以“非主流”自居的游走聚散的艺术群体,居然十有八九都是属于60年代出生、80年代成人的这一代!这种大面积的年龄集中和断层,不会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它背后无疑存在着一种“必然性”!

这一代人,不管是昨日的大学毕业生,还是今天的艺术家,还是工人、农民、军人、商人、干部等等,都共同承载着某些共同的历史表征,也摆脱不了某些未必自觉的心照不宣,这些朦朦胧胧的好像默契一样的东西,会经常提示人们,这是一个虽然边界不清,但又隐约自在的群体。

## 革命的迟到者

要理解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心灵,就不能不回顾20世纪中国的历史。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是“革命”——从辛亥革命开始,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革命”大潮,可以说一浪高过一浪;不管是什么样的旗号,怎样的领袖,怎样的政党,整个趋势是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入,从经济政治制度层面,到社会层面,到文化层面,最后则是全民总动员,举国上下从“触及皮肉”到“触及灵魂”……一个汹涌澎湃的“革命”的世纪,亿万人民的激情和冲动,真如人们所形容的,是“精神原子弹”……

而60年代出生的人,正是这个世纪培育出来的最后一批具有革命素质的“接班人”,从咿呀学语,就处于一个充斥着革命口号的环境中——不管是革命者还是被革命者,毕竟同处在一个天地间,你只能享受同一个话语。革命口号,是这一代人的“母语”,也是童年无意识的记忆,早已沉淀在心灵深处。

可是历史和时代的激变,又使得这一代成为唯一没有机会实践“革命”的人,这也是80年代如此激荡的一个潜在的原因。本来是为“继续革命”而塑造的心智结构,等到他们“长大”的80年代,却没有了用武之地;场景变了,语境变了——好像被提前遣散的特种部队!这种茫然的潜意识,自己感觉不到,却在不断起作用。我在另一篇回顾80年代的文章中写道:“那是‘现代化’和‘文化讨论’的年代,‘革命’时代的激情的惯性,再现为对‘现代化’的狂热崇拜,和对‘传统文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当时的学生都有点‘反叛’,基本心态就是‘重新评价一切’。”

然而,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时代不可避免地过去了!当这些没有机会参加革命的预备役革命小将们,情不自禁地不断制造革命式的游戏的时候,一种声音严厉地——也常常善意地苦口婆心地——告诫他们:请不要再革命了!

对于中国这个革命世纪的主旋律,他们是“迟到”的一代。从小培养出来的热血激情,变成了不合时宜的“盲目冲动”;“接班人”的素质和才能,变成了学非所用的屠龙之术;小学生品行鉴定中屡屡出现的那些“组织能力强”、“关心集体”、“热爱班级”等等的擅长,变成了不知所云的古文字……“骑士制度的时代过去了,代之以企业家、经济学家的计算机的时代”(美国某总统语),这是一个个体主义的时代,一个看不见的手的时代,一个理性、均衡和制约的时代。不仅革命过去了,古典英雄主义的时代也过去了,望穿时空的先知的时代也过去了。

这好像是一个新时代的“不许革命!”,一直是令60年代出生、80年代长大的人们耿耿于怀的一段回忆。作为80年代很多辉煌和荒诞的肇事者,这一代人会不可回避地留在未来历史学家的著作中。

## “理想”还是“主义”?

不少论者,包括很多当事人,把80年代青年描述为“理想主义”的一代,这种结论似是而非。且不说“理想主义”这个概念自身定义的复杂,仅就其一般语义而言,80年代固然有理想主义的特点,但这种特点,并不是80年代所独有的,此前的文革一代、

50年代青年、解放战争时期的青年、抗日战争的青年、国民革命的青年、清末革命党的青年……又何尝不是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似乎并不能构成80年代独有的品格，也不是80年代青年一代的标志性特征。

激荡人心的80年代，塑造了一种特有的人格，在文化心理上，最大的兴奋和忧患，都在于对想象中的一种彼岸化了的“西方”概念的认同和推崇。6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在“刚刚接触社会”时，恰逢国门突然洞开，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一边倒和孤立之后，轰然向西方世界开放；千千万万青春的、饥渴的、充满幻想的头脑，直接面对着一些全新的信息和符号；而电视媒体的普及，西方日本港台等“现代化”的视觉外观，伴随着无数传闻（其中也不乏误解、讹传），一举占据了这一代人的头脑，确立了关于“西方”的一种抽象化、理想化的幻想——就像17世纪欧洲知识界把“中国”当成一个与眼前残酷、纷乱的欧洲相反的、对称的一个完美社会的参照，来批判当时欧洲所有能够找得出的缺点。80年代的青年，是直接地毫不怀疑毫不犹豫地吧“西方”这个概念，和“完美”划上了等号。推崇“西方”，鄙视本土，成为一切思考的主轴。对本土的一切——从现存体制到国民素质到文化传统——统统成为中国落后的病源。“先进-落后”、“现代-传统”、“西方-本土”成为一切认知和思考的基本坐标，它不仅是认识世界的坐标，也是判断世界的标准，是好坏、善恶的标准。这种旗帜鲜明、爱憎分明的二分的思维，隐含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假设，明显地暴露出“革命时代”的孙悟空的尾巴。

伴随着这些西方的“外观”形象，更多抽象的东西——包括某些本来解放前曾经引入中国但在不断革

命中凋零怠尽的信息、思想、理论、知识等等，一发滚涌进来。西方哲学最先攻入中国，倒不是因为这些哲学如何魅力四射，而是因为中国的革命时代，塑造了一个“哲学万能”的信念和一个思想贫乏的现实；其他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都被平抑了，人们不管哪方面出了问题——不管是心理、思想、文化、态度——都要找万学之学的“哲学”寻求答案；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哲学、讲哲学，更是大大强化了这种“哲学治百病”的信念；所以在那种思想贫乏而又国门敞开的时代，人们好像垂危的饥饿者，疯狂扑向“西方思想”的面包，萨特、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弗洛姆……仿佛所有识文断字的人，都恨不能读一点西方哲学，否则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了。那些隐晦莫测的著作，在中国一国的销量，屡屡创下高于它们原文版和所有翻译版总销量的纪录！那个抽象的书中的“西方”，成了这一代人当时物质、情感、精神、思想力量的源泉！

这似乎是一场灵魂的自我拯救运动，正是在这种以西方哲学为龙头的引领下，与哲学最亲密的现代美学、艺术、文学、诗、戏剧、电影等等抢占了人们心灵的制高点，构成了中国新一代青年精英的新的信仰和精神支柱，与此同时，学术界大范围引入了西方当代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民族学等等学科，大量借鉴西方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等等专业思想，为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想充实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

80年代现代艺术的引进和张扬，和现代哲学、文学的蓬勃繁盛一样，属于青年人灵魂自救运动的一部分，当时被统称为“85时期”的新艺术潮流，正是这样一个由西方现代艺术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艺术精神和心灵解放的潮流，透过当时“国际青年美术展”、“第六届全国美展”和《中国美术报》等载体，蔚然成风。今天看到的都市艺术家群落，可以追溯到那一场开放和引进热潮激活的精神运动。

今天回过头来看，那是一个绝大多数人不知现实中的“西方”为何物而崇拜之的狂热。当时人们对“西方”的认知，是知识性的，是理念上和逻辑上的，而不是基于实践经验的。最热情推崇“西方”概念的人，几乎没有人真正在西方切身生活和体验，只是凭借片断的信息和意念来想象“西方”。人们头脑中对于“西方”的概念的构建，主要是凭借电影、电视、书籍、报刊杂志等等。今天我们知道，这种信息传播是片面和扭曲的，与现实中的西方社会并不一致。

这种“崇西”热潮，本身是中国社会震荡的摆



幅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状态 对于全国不同年龄的人来说,都是一股全新的气息,但它恰恰巧遇了80年代青年青春的热望和进步的冲动,化合成为爆炸性的除旧布新的激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所说的“西方”,就是“完美”和“乌托邦”的代名词,它的意义,不限于今天所指的具体的涵盖欧美地理、社会、民族和文化地方性的“西方”概念,而是更有点接近古代所谓“西天极乐世界”或“乌托邦”的幻想,今天的论者,切切不可把二者混为一谈。

80年代这种完美主义后来好像蜕变为一种精神上的洁癖,一种没完没了的心理痼疾,对每个人都是一 种看不见的牵扯,不管你朝向何方。由此,这一代人可能是今天自我冲突最多的一代,他们很难不加思索地投入到一种行动中,因为总会遇到内心深处的某些磕磕绊绊,虽然常常微不足道,但不断触及人们的神经。这一代人似乎具有一种不可摆脱的人格上的“风湿症”——一种自己身体内产生的莫名其妙的“抗体”,在不断地造成一种偏执的“反思”,又好像一切都永远“不到位”,他们就总是不如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那样,自然顺畅地面对眼前的一切,“当然如此了,本来就如此么,why not?”

### 新时代的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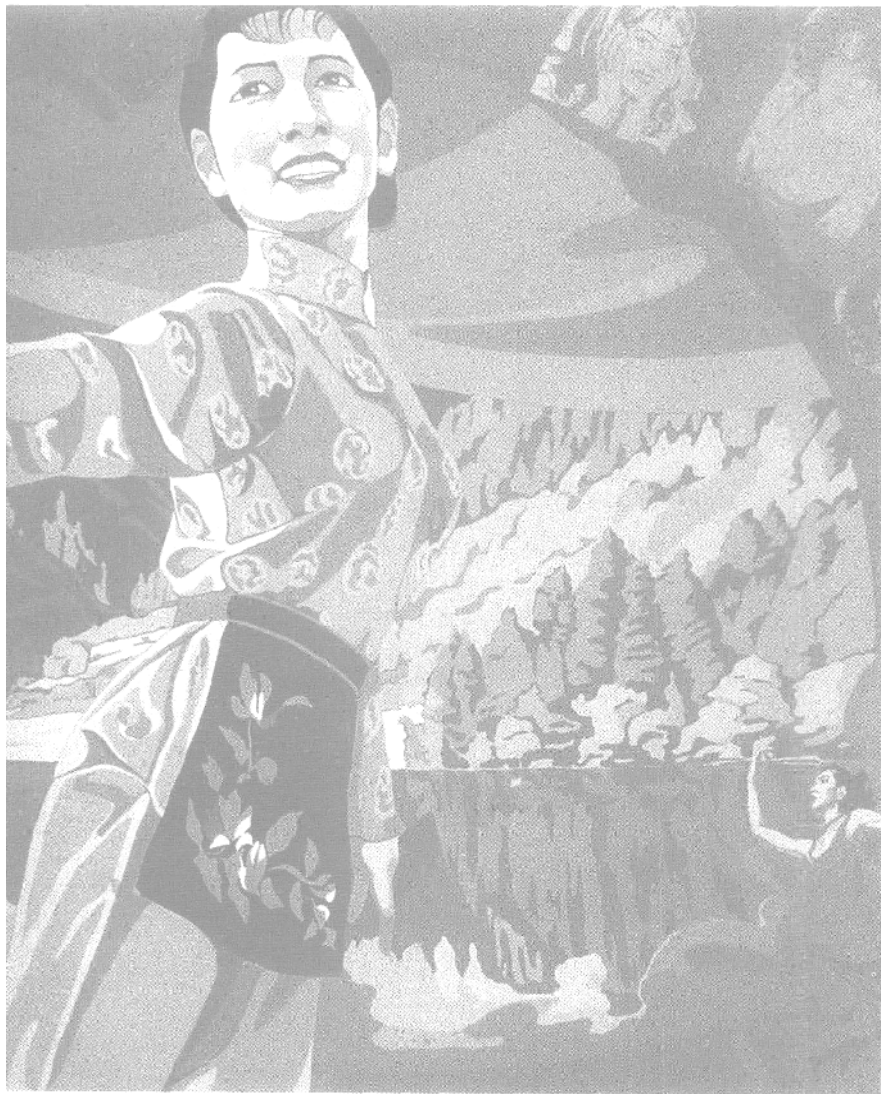
相对于中国一个世纪的革命,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迟到者,而对于正在到来的这个新时代——市场经济、个人主义、消费社会、多元文化等等,这一代人又不能顺理成章地接受,因为大家本来不是这样塑造的。对比之下,那些出生于70年代、80年代的新新人类,可以毫无障碍地直接接受这一切规范和价值,按照这一套去努力工作、发展、成功,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自然而然的,没有什么牵扯和障碍。可是60年代出生者,在突然面临这个全新时代的时候,则不得不经历一场新旧交替,因为心中已经有了一个革命的“初恋”,仿佛一套从小形成的、与当下迥然不同的操作系统,突如其来面临一个陌生的改弦更张,可是,并非人人都那么自然地喜新厌旧,移情别恋;头脑的格式化,总是有点不那么顺畅,是否因此激发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迟到》?……

对于80年代青年而言,如果说群众运动式的“革命”已经成为一种抽象的“过去”,那么新时代和未来,也不是真正的“现实”。当时才20多岁的这一代人,不过这个社会中的初来乍到者。对他们而言,新时代只是一个概念,一个梦想,不是抓在手里的实实在在的东西。特定的历史决定了轮不到这些人大大



身手。当时真正掌控着社会资源、真抓实干实现这个“现代化”的最有资历的行动者,是文革一代——要么下乡回城,要么最早参加恢复高考学成,要么第一批出国留学归来,要么兴办乡镇企业等等。这一代人50年代出生,正好大十岁左右,但文革的延误,使得他们的事业的起点,与60年代的出生者同时起步;但他们的资历、生活阅历、个人能力,远在那些20岁的青年之上,他们很快就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而80年代的青年,尽管具有某些优势,但总体相差悬殊,只能甘拜下风,成为别人的跟班。

这是60年代出生、80年代长大的这一代人的一种宿命般的尴尬。旧时代和新时代,都只能是抽象的符号。过去的当然过去了,不仅过去了,而且还是“错的”,是全盘否定的;而扑面而来的“现代化”,也同样只能是一个理念和词汇,离实际操作相去甚远;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处境,也多少抑制了这代人的世俗成就,但新时代“天之骄子”之类的神话,又暗示和鼓励这些人把自己当成时代的天然主人翁。他们毕竟是文革后上中学的一代,是科班出身的“现代人”,是革命时代之后受过最完整教育的第一代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要承载历史国家民族的重任,天降大



《春到芳草海》张溯

任于斯人也，舍我其谁？这一代人似乎只能抽象但又充满责任感使命感地诠释世界。对现代化的憧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美好社会的期望，都是一种空空对空的观念游戏。

90年代初的“下海潮”是一种很生硬的社会转型，60年代一族充当了这场硬性填充未来和历史之间空隙的社会运动的骨干。它也可以算是这一代人对于新时代的一种特有的实践和回应。当时人们下海，很多是基于一种理念而不是具体的利益动机，事实上依旧是这一代人特有的意识形态化了的生命激情的最后一次集体表达。所以很多人从一开始就缺少一种资本家的心态、直觉和本能；下海的一半重要性，在于从现有体制中“出走”。这种有点夸张的毅然的告别，仿佛是跟理念中那个令人神往的“现代化”的一种“私奔”证明着一种人为否定和拒绝旧时代的快感与决心，至于未来的前景，反而不是一种真正的拉力……夹在命运当间的60年代出生者，命中注定只

能用这种生涩和行为艺术似的方式迎接本来属于本能、放纵和娱乐的新时代。

比如Z君，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部委，待遇优厚，但1990年坚决辞职，梦想是先拼命干几年赚到钱后，经济上获得自由，就可以做“自己想真正感兴趣的”思想和哲学方面的研究。因此，自己租了一个小房间做办公室兼卧室，从事出版业，在南方一笔生意赚了几十万，成功脱贫，马上投资开办一个建筑设计所，生意蒸蒸日上，直奔百万千万富翁而去，但常常抛开自己的业务，埋头钻研一些毫不相关的历史、哲学、宗教文献，并创作其实豪迈的诗词和书法，后来恰逢股票热潮席卷中国，他也闻风而动，勇往直前，投身股票期货市场，结果大笔资金化为乌有，直到输得精光，回到北京，找朋友借了几百元，又回到当年刚辞职时租的那个破房间，从头开始，此时离他离开这个房间，差不多10年……

回想80年代青年发出的直白的呐喊，就表达了这种悬在中间的心境，如果说崔健“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激情咏唱，代表了这代人对于新旧交替的茫然感叹，那么海子的“面向大海，春暖花开”——这种优美但又总有点别扭的语句——就是这一代人典型的对于新时代灿烂前景的一种虚拟的乐观，是对于切身和彼岸分裂的一种幸福幻觉的眺望。

这些精神化的人格，在感受新消费时代市场和金钱的现实中若有所失的感觉，不断演绎出一些“失乐园”的神话，记得一位在80年代末大学毕业前一个多月突然被勒令退学的诗才，改行写流行歌曲歌词，在十多年后为一首宏大的大合唱撰写歌词，反复咏唱“离开校园我们是多么的艰难？”；而近年一个标题为《感受金钱》的现代画展，则更是赤裸裸地把这个话题，摆到了艺术展台上。

### 流浪意识

这种悬吊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群体意境，造成了80年代的青年，常常怀有一种其他时代的人看起来莫名其妙的“流浪意识”，在当时青年学生自发编辑出版的各种诗歌和校园歌曲中，一个幽灵一样不断浮现的主题，就是“流浪”。比如当时北京大学比较早的学生原创的校园歌曲，就是描写自己“去流浪”：

你还是左右跟随我，  
洒满阳光的大路上，  
人说这样流浪能找到天堂，哦……

一年一年长长的路，  
解除脚上的锁链，

日复一日，尘土满面，  
我们已经不在乎……

在人们的梦想世界中，“流浪”是一个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意象，事实上，它的本意，不是指一种现世的物理意义的位移状态，而是一种心灵的漂泊感，它是自由，但又不是那种轻松的散漫的自由，而是一种别无选择的自由，是强加于人的自由，难道是无路可走，只有自由？这很古怪么？好像隐含着发配、流放的感觉（记得当时有一本诗集《在流放地》），但又不是真的被迫的，而是自愿的、志愿的……复杂的感受和概念的迷宫，似乎预言着一种荒原狼般茫然的自由的担忧？这是一种诗化了的后革命主义的神话，它成为一种生命体验和修行的隆重的、悲剧性的生命仪式，仿佛是一种具有宏大历史感的成人礼。不管怎么说，一个人只有经过充分的流浪，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流浪成为检验“世俗”与“超越”的试金石。在这种本来抽象理念多于具体现实的“流浪”的冲动中，某些人真的开始了现实中、人生中的“流浪”，造成一代人特有的彻底的固执与洒脱。这种风尚，由于被掩映在下海大潮的喧嚣中，常常被世人忽视。事实上，包括下海潮在内的社会走向，背后都有这个流浪审美的怂恿和催动，而大批画家告别故园奔赴北京这样一个新天地，也是这种流浪意识的坦率的实践。

很多新艺术流派的创始人，也是这种“流浪”和“洒脱”的典型。比如后来被称为“艳俗艺术”的发起人之一的画家X，作为80年代风风火火的新潮运动的参与者，成为“红色旅”的成员，但后来却疏远了那个事业，游离不定，等到后来来到圆明园，加入到政治波普的行列，但结果又是身在曹营的错位，最后和Y等人相遇，构建一个新的艺术流派。但是，他对于这个本来可以安身立命的品牌，也没有一种全身投入大干一场的豪情，因为心依旧是“漂泊”的，否则也不至于始终摆脱不了“玩世”阴影。甚至在最后一个迁出圆明园的时候，又避开随大流的宋庄，独自选择了自己独立的居所，表现出对固定身份和群体认同的回避，仿佛拒绝和惧怕靠岸停泊。至于Y，随着现代艺术向社会主流中线的漂移，作为艺术家的Y，反而被作为艺术评论家的Y给取代了，他作为典型的圆明园画家和艳俗艺术发起人，多年的美术生涯，竟然修出了一个艺术评论家和文化学者的正果，这中“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职业反串的生态，暗示着60年代一族的彻底的、绝对的、不妥协的流浪主义的自由观。

流浪并不限于艺术，比如J先生，80年代以优

异成绩考入某名牌大学生物系，那是当时录取分数最高的理科系，本科毕业后一半左右可以出国深造，但此人觉得不出国，有什么不同？“我学生物，在国内是穿个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出国也是穿个白大褂在试验室里，有什么不同？”因此中途改专业，改学社会科学，自称自己有生物学基础，研究社会最好，因为人这个东西，反正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毕业后，放弃所有正式职业，浪迹天涯，以演讲为生，去各种中学传播他的人生体验，启发学生如何长大如何面对社会人生等，毕业15年，仅仅维持生计，至今依旧如此。

M先生，北京人，大学毕业后，在当时放弃国家分配，自己找工作，每天早晨按照《易经》方式认真占卜一次，然后出去找工作。终于找到某宾馆工作，其间目睹一起旅客投诉某房间“闹鬼”的故事，后离开旅馆，去某合资家具公司工作，又转山东某投资公司，派驻上海，一反通常北京人对上海的成见，十分欣赏当地文化，后在上海某电视台主持节目，但又辞职不干，想自己搞电影，后去美国，到处旅行，又回国，闲居两年，写无数怀旧、怪异电影剧本，其中一部得以拍摄，还获奖，但并没有顺势发展，而是随便找一家旅游部门工作，往来于各国，周游世界，目前又想辞职，恰好偶然听说多年前随便撰写的一个剧本可能有人要拍，但人们不知如何找到他通知他……

莫非这就是这一代人无法真正摆脱的宿命？在个体消费主义的时代，60年代出生的人，被遣散成了散兵游勇，不得不变成真正潇洒流浪一族？物理地理的流浪，心灵的流浪，精神的流浪……但这是一个伴着激情成长的群体，他们因为固执，不会被同化在芸芸众生之中，不会泥牛入海销声匿迹的，反而出现了不少游侠式的人生，倒不一定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地理意义上的杖剑千里，而是在社会结构、行业、阶层、话语、信念、群体、角色等等非物理范畴和场域中，上下求索，纵横驰骋，不断发动着一个人的“革命”，一个人的“战争”——当然不是现实的暴力行动，而是思维、生活方式、观念、创造性等等，这仿佛是一个未完待续的无止境的心灵之旅，正像德国诗人赫尔德林在不断的精神超越和升华中，独自一人一次又一次跨越欧陆的徒步旅行。

## 生活在别处

记得曾经和一位朋友谈到这一代人，我问：“您觉得这一代人有什么特点？”这位身在其中的友人思考良久，无奈地说：“我觉得这一代人什么都没有，就没什么可说的，嗯，这一代人不行了，你看，现在真正

成功的,要么是知青那一批,要么是70年代出生的,各行各业的骨干都是那些人,60年代出生这些人好像不行……”

这也算是一种常人的知觉感受吧。这一代人究竟是行不行呢?历史也是见仁见智的。

当80年代的大学生们终于走向社会,他们是怀着各种不合时宜的观念、价值、梦想和激情,这些东西,和社会现实有很大的落差,所以这一代青年,在现有的、常规的行业或职业,都可能出现一种“心不在焉综合症”如果套用一本曾经很热门的书的名字,叫《生活在别处》,就是人们在现实的日常的生活工作之外,总有一个想象中的另一个世界,它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彼岸世界”,尽管缥缈,但魅力四射,时时吸引着人们真正的兴趣,诱使人们忽视世俗现实,这也是人们常说很多80年代这批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在现实工作中不专心、不投入、成就不彰的原因。

心不在焉的心态,也常常造成“一走了之”的冲动,典型的表现,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汹涌的出国潮和下海潮。

这一代人的“出国”,不是一个一般的到某某国家去的求学或旅行,而是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积淀塑成的一种特有的关于“中国-世界”关系图景的诠释。“出国”这个概念,汇总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界世界的多种心态和情怀,也是一种规模庞大的文明衰落后不时迸发出来的种种非系统的、非理性的、游走型的社会病理反应之一,我曾经戏称之为“心灵的偷渡”。当时的“出国”,其着眼点不在于去哪里,而在于“离开这里”,只要离开,就是“成就”,不管是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还是什么地方……在国人眼中,“国外”似乎就是乐土,“出国”就是最终解决方案,“外国”仅指那些“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极少数的那几个富国俱乐部,而占世界上人口大多数的那些非西方、非发达国家的“外国”,似乎不存在一样。

“下海”当时特指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打拼,实际上它具有更为广义的所指,那就是怀有某种“彼岸”式的“召唤”,离开现有体制内的既定的工作、职务或机会,自己去闯天下。国家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的人们辞职或停薪留职去干公司;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放弃国家的分配和安排,自己去找工作;文化艺术领域的人们离开美院、群艺馆、宣传科、歌舞团等等,自己去作自由艺术家……这种“离开”,潜在的含义,和“出国”是有某种暗合的成分的,就是离开那种既成的、稳定的、常规的、有时常常是过时的机构和状态,走上一条自己闯荡、探索的不归路。前方是未知

的,但这种未知,具有一种巨大的魅力和魔力,人们在实际上茫然的情景下,就可以为此而放弃一切,破釜沉舟地一往无前,这体现了“革命”的基因,一种深层的自信、乐观和未来取向的热情,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可以向善的——至少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此——未来会好的,“面包会有的”。

这一代人永远摆脱不掉“一走了之”的冲动和独自一人背上行囊、到遥远的地方去追梦的挥之不去的意象,而艺术家又是这种冲动的一个浓缩极端的代表。最早的圆明园艺术家群体,实际上是一些在主流社会中总是感到心不在焉的艺术人,试图把“彼岸”变成现实生活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实验。差不多与下海热潮同时,如此之多的艺术人毅然辞掉原来的工作,放弃主流途径,只身来到北京加盟圆明园画家村,为的是创建一个“地上的天国”。

但圆明园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人间天国”,也就不会成为人们的归宿和终点。身在画家村,还是摆脱不了这种“心在别处”的魔影,因为那个抽象的、纯粹的、自由的“画画”的概念,还是一种没能实现的彼岸世界,仿佛乡间“鬼打墙”的传说的夜行者,眼看着前面的灯光,却又永远可望不可及。从圆明园画家群体溢出的一批人的人生道路,凸显了这种永远的彼岸意识。某画家D在圆明园的鼎盛时期,反其道而行之,迁出圆明园,屡经颠沛,后来纯粹为了饭碗,从事过动画、电影美术、建筑设计、美术编辑等多种工作,最后有报社朋友求他帮忙画新闻插图的契机,落草于漫画行业,一干十年,小有名气,但对这个工作从来没有热情和感情投入,一直想随时改行“干点别的”,也无法割舍纯粹的美术创作,现在收入足以频频周游世界,但始终想什么时候可以安下心来,还是要“画画”。对他来说,纯粹的“画画”,成了一种永远的“别处”。

至于那些从圆明园出来后改行的人,也逃不出这种永远心不在焉的魔咒。圆明园画家村的故事结束之后,某些人转入了当时还刚刚兴起的电脑设计和三维动画制作方面,实现了美术和高科技的结合,这些人中某些顺利者后来完全步入白领阶层的行列,尽管在某些美术原教旨主义者看来,这些人似乎有“变节”之嫌,但是他们对于画画的永远的情结,又促使他们不时遥望一下心中的彼岸,情不自禁地抽空举办一点个人画展之类的动作,来舒缓自己复杂的心境。

### 独自孤独

志愿的流浪者大多是独自一人的,“独自徘徊,独自孤独”(某校园诗人诗句),也难免孤芳自赏。60

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骨子里常常有一种时代铸就的不可救药的“高傲”——或者用一个中性的词“自豪”——在看似集体话语的伪装下，常常掩盖着孤僻和自闭，行为上我行我素，心理上旁若无人，偏执固守自己某些莫名其妙的完全形而上的感受和原则，非要“把自己进行到底”，面对现实与理念的冲突，充其量也就是暂时的妥协，但很难彻底放弃。可是，这种倾向也造成这个群体自身的分裂，由于每个人个性、背景、嗜好、关注的不同，每个个体的这种任性的执着，使得大家彼此之间渐行渐远，四散而去。

一位朋友概括说，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是“被时代拆散了的一代”，这个说法，意味深长。

1980年强烈的单线进化思想和“崇西”风尚，在90年代被逐步解构，特别是关于“后现代”的讨论，即使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也已经足以把水彻底搅混。随着这一代人越来越多地深入本土和走出国门，亲身体会了现实的中国和现实的“西方”，他们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各自的反省之中，其结果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这一代同龄人之间在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认知和态度上如此相差悬殊和隔膜，在近现代中国并不多见。比如，红卫兵的恶斗固然惨烈，但毕竟基于同样的“造反有理”思维方式，新新人类的个性固然张扬，但毕竟认同市场竞争干活吃饭之类的基本原则，可是60年代一族，在最基本的认知假设上无法达成共识，彼此之间不是“我不懂你说什么”，而是“我不知你是什么”，冥冥中好像暗合了80年代这代人的一首打油歌：再过二十年，我们四十多岁，走在大路上，谁也不认识谁……

但是这种离散的思维，对于很多个体来说，反而造成一种局部的宁静和逍遥，就像太多不同的音乐同时演奏就变成没有意义的噪音一样，太多不同的感受和思考，反而无需认真对待了，它把人逼出一种“管他呢”、“爱谁谁”的态度，还不如一条道跑到黑，就一门心思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某画家W在“后圆明园时代”，迁居他处，但每天骑自行车长途跋涉，回到圆明园内给游人画像，维持生计，但其作画中的专注和执着，仿佛世界上别的事情都不存在了。每每看到他，我就感觉，他似乎一直如此，永远如此，仿佛自从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了。

画家，L先生，没有上过美院，完全自学成才，画画就是因为喜欢画画，多年来一直专心画画不已。他先在画家村，后来到了通州，但始终保持这种状态。尽管过去十年，中国和北京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事全非，恍如隔世，可是他仿佛与此无关，

不计褒贬，不随潮流，终日埋头于他人不屑一顾的、“过时”的具象写实风格中，尤其是倾全力描绘砖头这种“死硬”但又人气十足的东西，以及大葱大蒜等等平凡但刺激的东西。他的砖头如此动人，一位清华同方搞工程的科技人员看了之后，指着一幅画感慨说：“这些砖头，都是70年代以后生产的，那以后才有自动造砖机，切割泥坯会留下这种划痕；还有这里碎掉了一块，说明质量已经在下降了，70年代之前的，不会这样。”他又指着另一幅画说：“这才是60年代的砖头，一看就是，你看这质地！”

象L君这种纯粹为了自己兴趣活着的人，在1990年以后，已经日渐稀缺了；但这对于60年代这一批人来说，似乎又不是那么不可思议；因为在这代人的生长期中，这种为兴趣而活的状态，并不像今天看起来这么古怪。在彻底的计划经济的时代，人们固然没有很多“选择”，但也并没有那么多“事业”和“事务”；对于一个不想当官的人来说，在必须参加的种种政治活动之外，就只剩下没人管的“活着”了，所以实际上是很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的。那时候，命运是被确定的，一个出身于农村的人，除了当兵之外，也就没有其他离开土地的可能了；对于一个城市孩子来说，反正长大了都要上山下乡，反而没有那么多压力了，也就没有今天应试教育下那种穷挨苦熬的“学习”了。既然未来已经如此明确，那就在现有条件下尽量随心所欲地活吧！反正也没有上大学之类的可能，那还不如学学美术什么的，将来不管是下乡还是当工人，经常画画板报，搞点宣传，也可以少吃一点苦……

当然，还有极端一些的，比如某圆明园画家W，在“后圆明园时代”，没有加入那些新的画家群落，而是置身于都市社会的日常生态中，坚持“活”了几年之后，淡然自杀，为的是“和世界和解”。

……

关于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万语千言，堪述此情”（荷尔德林《帕特默斯》），还是引用80年代的口头文学，来见证这些被解散了的红小兵们的品格吧：

馒头诚可贵，  
花卷价更高，  
若有大肉包，  
二者皆可抛！